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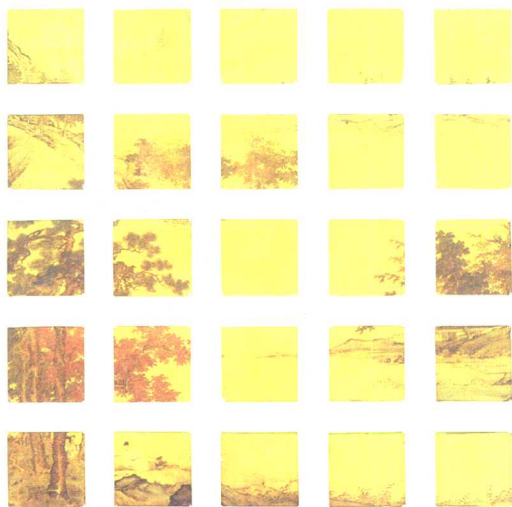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传统

这里所说的『小皇帝』，却是加了引号的，这不是历史上曾有过的景观，而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鲜事……孩子这根独苗在家中的角色独特，

中国社会生活谈丛

地位尊崇，大人们围着他倒似众星拱月一般。也不知是谁给这样的孩子起了个显赫的名称——『小皇帝』，反正这称号早已流行开来，成为汉语中的一个新词。

角色



中 国 人 的 传 统 角 色

周积明 主编
钟年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的传统角色

钟年 著
周积明 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传统角色/钟年著.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中国社会生活谈丛/周积明主编)

ISBN 7-5351-2404-6

I. 中… II. 钟… III. 角色理论-研究-中国
IV. G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557 号

出 版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85443735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6.25 印张

版 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40 千字

印数:1-5 000

ISBN 7-5351-2404-6/G·1971

定价:13.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中国社会生活谈丛·总序

人类的历史既是一部文化的历史，又是一部社会的历史。然而，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都在东西方的史学传统中缺乏一席之地。诚然，在司马迁、希罗多德以来的浩瀚典籍中不乏有关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丰富记载，然而，古典的与中世纪的史学家们深为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梁启超指出：以往的中国史“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麦考莱的《新英格兰史》也揭示，西方的传统史学，只是对政治和军事事业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喋喋不休的叙述，其中充斥的不过是“一些战役的围城；行政部门的盛衰；宫廷里的密谋”。他们的尖锐批判，深入到东西方古典的和中世纪的史学的文化本性。

18世纪的启蒙时代开始廓清人们的视野。在其后的一二百年间，人民的历史、人民的生活日益为史学家们所关注，本世纪20年代崛起的法国“年鉴派”把“社会生活研究”鲜明地写上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

1706-108

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深入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派”史学家雅克·勒维便便在《法国史》中明确指出：重要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固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描述了15至18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食品结构、日常起居和服饰、技术发展和货币状况，显示了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1942年，屈威廉出版《英国社会史》，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为人民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研究的价值和地位进一步得到强调。

中国学者对社会生活研究的关注开启于本世纪初年。尖锐批评旧史“不过是帝王家谱”的梁启超着重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自初民时代以至今日”的“衣食住等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等等社会生活内容。1911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中国学者研究社会生活史的开端。在此后40年的时间内，有关社会生活史的论著蓬勃涌现。其间如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贾仲的《中华妇女缠足考》、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袁业裕的《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研究》等，皆是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社会生活史的专著。瞿宣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则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史料，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至今还在受其惠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学的新阶

段。唯心主义历史观受到尖锐的批判,漠视阶级斗争的旧史学传统得到有力的反拨。然而,新中国史学在体现历史正当性的同时,却陷入了另一种历史错误:一方面,历史研究高度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兴趣,阶级斗争、生产关系、民族关系以一种制约性的方式成为史学研究的中心和全部内容。另一方面,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被取消同步,文化史、社会史遭到冷落。虽有王瑶著《中古文人的生活》、李亚农著《殷代社会生活》、吴晗作《古人的跪拜礼》、《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谈烟草》等有关古代社会生活文章,但整个社会史的萧条局面未能因此改变。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政治格局焕然一新。沉寂30年的社会史同社会生活史研究在人文科学复苏的春潮中也勃发生机。在其后的20年时间内,社会生活史研究持续扩展,以致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振兴,包含着史学思想的重大变革。首先,它体现了一种“自下向上看”的历史主张,把对普通民众的研究放到首位。其次,它深刻地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文物制度的美轮美奂,而且更鲜活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中。正是衣食住行一类琐碎生活,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民族的文化样式。

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在多年的文化研究中一直贯穿一条独特的理路,这就是始终关注于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为此,它把研究重心放在精神的物化与物化的精神,放在民族精神的“外显”与“内隐”,具有文化史和社会史整合

意义的社会生活史自然成为该所的研究方向之一,而《中国社会生活谈丛》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理路中酝酿产生。诚然,对于丰饶生动的社会生活史而言,《中国社会生活谈丛》提供的仅仅是十分有限的图景,但读者诸君毕竟可以从中看到曾经鲜活存在于我们祖先生活中的若干历史内容,进而加深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周积明

1997年12月

目 录

仁义君子.....	1
新《师说》	9
婚嫁与新娘	16
“小皇帝”	23
老人琐闻	28
寡妇述略	37
巫的源起及流变	44
闲说皇帝	52
杂侃太监	60
大魁天下状元郎	67
门子·门人	74
丐帮与丐	81
娼妓漫议	91
奴婢拾零.....	100
哀哉流民.....	108

图穷匕现话刺客	115
山林隐逸	123
侠士放谈	132
粉墨生涯论优伶	142
名妓与名士	151
须发问题	159
中国的种姓制	165
成年的界标	170
边缘人	176
“可怜薄命作君王”	184
 后记	 191



仁义君子

清人李汝珍作《镜花缘》小说，凡一百回，内述武则天时秀才唐敖乘商舶遨游海外，路经君子国。那“唐敖因素闻君子国好让不争，想来必是礼乐之邦，所以约了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这君子国果然没让来自中土大唐的人失望，入境未久，便遇到奇事：

说话间，来到闹市，只见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只听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

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允。试问‘哪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之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付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走过两个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镜花缘》第十一回）

信步前行，这类买卖双方角色颠倒的奇事触目皆是，唐敖大开眼界，连连称赞所见的是“‘好让不争’的一幅行乐图”。

君子国并非李汝珍首创，而是早就有着白纸黑字的记载。《山海经·海外东经》曰：“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晋张华在其《博物志·外国》中继承了上述说法又略有增益：“君子国人，衣冠带剑，使两虎，民衣野丝，好礼让不争。土千里，多薰华之草。民多疾风气，故人不蕃息；好让，故为君子国。”由此观之，君子国的国民之所以被称作君子，一是“衣冠带剑”，一是“好让不争”。前者是外显的装束，合于礼；后者乃内蕴的品德，发乎仁。能与这样的君子相处，确实不错，只是君子们常牵着两只大虎行动，不免令人畏惧，或许这正是在提示着凡人与君子的距离吧！

《山海经》、《博物志》中的君子国是神话，或者说是古人的一种理想。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君子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君子乡”，据《后汉书·王烈传》载，东汉末王烈义行称于乡里，恒以德感人，盗贼亦为所化，故时人誉其所居乡为君子乡。乡的范围肯定远逊于国，但若说一乡居民都是君子，却也令人怀疑。因为无论古今，君子的称号往往会有些拔高，而树立典型的需要，又会使人忽视群内的差异。当然，整国整乡的君子难以置信，但并不等于单个或数个的君子也不存在。

“君子”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出现较早,甚至在先秦时它的出现频率还极高。其最初含义,与“君”有关,指上层统治者及贵族男子,如《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孔颖达疏引郑玄注曰:“君子,止谓在官长者。”所以,《国语·鲁语上》称:“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后来,“君子”被用来指才德出众者。《仪礼·乡饮酒》:“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曰:“君子,国中有盛德者。”汉班固《白虎通·号》:“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宋王安石《君子斋记》曰:“故天下之有德,通谓之君子。”《礼记·曲礼》则从行为主义的角度下定义:“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的问题,受到了先秦诸子的普遍关注,在儒、道、墨、法诸家的代表性著作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都多处讨论了君子,看来当时社会上对君子的钟爱并不亚于今人对神童的偏爱。

对“君子”的议论多了,一一梳理便十分困难,只好避重就轻,专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论语》来看一看。《论语》使用“君子”的地方极多,据杨伯峻先生统计,竟达107次,与热门词“仁”(109次)接近,可见孔子及其弟子是多么关心君子的问题。在这里的师弟问答中,有关“君子”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涉及到了,若能加以分门别类,深刻领会,那么对君子这个角色的理解大概就较为全面了。

君子是“仁”的化身。在孔子看来,君子哪怕是在吃一顿饭的时候也离不开仁,紧迫匆忙的情况下要讲仁,颠沛流离时也不例外。君子的品质中包含着仁、智、勇,而“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讲求孝弟,这正是仁的根本,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甚至君子交友,也是为了培养巩固自己的仁德:“君子以

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仁”又连结着“义”，孔子认为君子的行为准则应该是：没规定他要怎样做，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做，只要合于义的就去做。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把义视作做人的基础。因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君子的“尚勇”，也是“义以为上”（《论语·微子》），并不是茫茫无方向的匹夫之勇。

君子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言行问题上，孔子更看重行，所以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最好是先把事做了再说，“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而说得多做得多，实乃君子之耻，“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说得多做得多，甚至光说不做的人，是不配跻身君子行列的。孔子就曾提醒人们：“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论语·先进》）言论虽然笃实，但若见不到行动，焉知他不是伪装庄重的假君子？

君子在社会上有好名声，就是君子本人，也希望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众人的称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但要得到名，往往要在物质利益上有所牺牲。要当君子，先要有不怕吃苦的心理准备。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为政》）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能安守贫困而不改志向。这也就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同上）。

一个普通的人要想变成受人称颂的君子，关键是能否严格要求自己。“君子求诸己。”（同上）就是在当上了君子后，也一刻不能松懈。在《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出了君子的“三戒”和“九思”：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三戒”是说君子在少年时莫迷恋女色，壮年时莫争强好斗，老年时莫贪得无厌；“九思”则提醒君子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君子严于律己，虽然他看重名，但别人不了解他时却并不怨恨，故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因为“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知己也”（《论语·卫灵公》），他会检讨自身的原因，是不是自己能力不够或者德行尚浅，否则别人怎么不知道呢？

以上并不是《论语》中提及君子的全部内容，孔子还说过许多有关君子的话，如“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君子矜而不争”、“君子周急不继富”、“君子博学于文”、“君子不忧不惧”、“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泰而不骄”，等等，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是孔子等人理想中的君子。从社会心理学角色论的角度看，这便是当时人们对君子的角色期待。很明显，在现实社会中，完全达标的君子几乎是找不到的。孔子等人在讨论某人或某种行为是否为君子时也并没有搬上全套标尺，甚至还认为标准会因时代而异，这从《论语·宪问》中“子路问成人”一段即可看出。

《论语》中创设的君子标准，自汉武帝确立儒家独尊地位以后，逐渐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威。历史上的人物，要想戴上“君子”的桂冠，都得在这个无形的筛子中过一遍。标准虽然严格，但不同时期还是产生了一批人们公认的君子。限于篇幅，下面只能作些跳跃式的扫描。

孔子是立标准的人，而他自己便是一位君子。证据见于《论语·宪问》，当孔子谦虚地提到君子仁、智、勇而自己做不到时，

子贡说：“夫子自道也。”认定自己的老师是仁、智、勇兼备的君子。孔子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其中有多少可称作君子，却未见具体数目。以孔子之严格要求，恐怕不会太多。例如子路，乃弟子中名气极大者，他死于结缨，其生前最后一句话是：“君子死而冠不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见子路是以君子标准要求自己的，但当季康子问“子路仁乎”时，孔子却说“吾不知也”。“仁”是君子必备的品质，如此子路能否为君子就很难说了。

在《礼记·礼运》的记载中，孔子曾一口气提到六位君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六君子都是孔子之前的人物，其事迹人们难知其详，从留下的文字看，他们心存仁义，行由礼法，称为君子树作榜样自无问题。以此推之，禹之前的尧、舜，也当在君子之列。

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君子骤然多了起来，这与社会环境有关，可说是“时势造君子”。据《后汉书·党锢列传》：“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阹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宦官集团自不甘遭人抨击，遂大兴冤狱，滥捕士人。但这并没有吓倒士人，他们反而联合起来，奋起反抗，“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日知录·两汉风俗》）。时人慕其高义，将其中的杰出者分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以他们为“仁人君子”（顾炎武语）的代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批君子，确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例如李膺在被捕前，乡人劝其逃去，李膺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无畏无惧，慷慨赴死。范滂被捕后，每次受审时都“越次而进”，争受苦刑，公堂之上，仗义陈词，死时仅

33岁。由于他们追求正义,崇尚气节,因而得到了广泛的理解与崇敬。当时社会中就流传着“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的口号。范滂第一次入狱被释后,汝南颍川乡人迎于半路,仅车马就有数千辆;而当他再次被捕与母诀别时,其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鼓励他以成仁取义的实际行动,做一个真正的君子。

与东汉桓灵时相似的社会环境又出现在明末,对立的双方依然是宦官与士人,正义的天平也仍在士人一边。当时魏忠贤把持朝政,威福任情,政治黑暗。东林党人则力斥宦官专权,欲革除时弊,重振纲纪。两派势力水火不容,阉党利用厂卫机构,对东林党人血腥镇压。首次党狱逮捕了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等六人,严刑拷打,将他们全部折磨致死。一年后再兴党狱,又捕入高攀龙、周顺昌等7人,同样将他们害死于狱中。这13人面对死亡,不屈不挠,用鲜血证明了自己的高尚人格,史称“前六君子”、“后七君子”。

在100年前,人们又看到一个“六君子”。当维新变法失败、局势险恶时,康、梁出走国外,有人劝改良派代表人物谭嗣同也设法逃走,谭却泰然自若,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清史稿·李端芬谭嗣同等传论》)遂被拘于提督衙门,几日后,与刘光第、杨锐等五人英勇牺牲,时人称为“戊戌六君子”。

综观孔子之后的这几批君子,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血肉来实践君子最本质的品性——仁义。他们的仁,是杀身成仁;他们的义,是舍生取义。这样的人若不是君子,又有谁配称君子?

不过,孔子所制定的君子标准,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将君子定位于士大夫以上的阶层,而下层百姓,只以“小人”视之。

但历史的事实,却提供了有力的反证。还是在魏忠贤虐杀东林党人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能几人欤”(张溥语)。可苏州的百姓,在缇骑逮捕周顺昌时,激于义愤,群起暴动。事后朝廷严究,颜佩韦等五位市民为保护群众,挺身投案,从容就义。不久,人们为他们建墓树碑,复社领袖张溥作《五人墓碑记》,热情颂扬他们的事迹。在文中,张溥有感于这五位普通百姓竟能做出许多士大夫做不出的举动,忍不住发问道:“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鲁迅先生针对此事作出了回答:“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看来,张溥的疑问,是因为他还没有突破君子莫非士的成见。而今天的人们,自不必仍囿于孔子的君子标准。对颜佩韦等五位百姓,我们用不着像张溥那样,在称颂他们仁义的同时,只含含糊糊称其为“五人”,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称他们为“五君子”。孔子尚能“有教无类”,君子的认定又何须问他士农工商?